

中国文化丛书

苏士澍谈中国金石文化

苏士澍著

(④)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何兹全任继愈  
主编

文化中国丛书

# 苏士澍谈中国金石文化

苏士澍 著

主编：何兹全 任继愈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士澍谈中国金石文化 / 苏士澍著. —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11  
(文化中国丛书)  
ISBN 978-7-5358-4657-0

I. 苏… II. 苏… III. 金石学-研究-中国 IV.K877.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4887 号

**总策划：**丁双平 胡 坚

**执行策划：**吴双英

**特约编辑：**赵宇泽

**责任编辑：**胡隽宓

**封面设计：**肖睿子

**内心设计：**罗俊南

**出版人：**胡 坚

**出版发行：**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湖南长沙市晚报大道 89 号 **邮 编：**410016

**电 话：**0731-82196340 82196334 (销售部)

0731-82196313 (总编室)

**传 真：**0731-82199308 (销售部)

0731-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 销：**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 刷：**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5.5

**印 数：**1-18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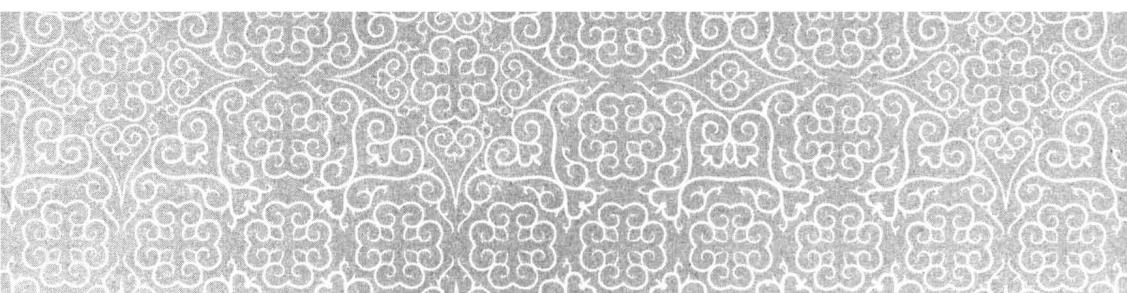
**版 次：**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 总序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代世界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国家，多数没有维持下来，唯有中国这个国家从原始社会到形成国家，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五千年以上。我国的文化文明史从未中断，一脉相承，屹立于世界之林，历久而弥新。

我国文化起源于上古，大致在黄河、长江及其周围地域形成，是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同时又是在连绵几千年中，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不断交流渗透和大融合的结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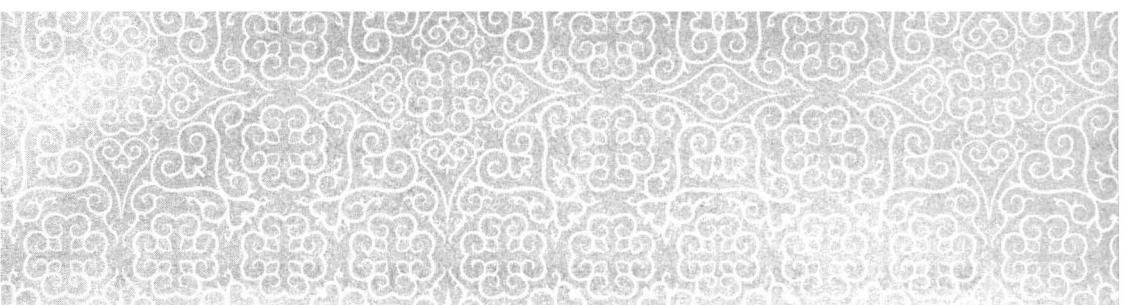
今天，我国正处在飞速发展的新时期，了解过去的优秀文化，正是为了创造未来的新文化，这对于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对他们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是百年大计、千秋功业，因此可谓当务之急。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要有长远的目标，要让中小学生和拥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掌握和了解我国文化传统史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识，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和修养，以更好地继承发扬优秀文化传统。这是一项宏伟的事业，应引起更多的关注和重视。我在大学教了大半辈子的书，我以为现在大学生的文化素养正在慢慢下降，原因可能不在大学，而在中学，中学底子如果没打好，到大学再改造就困难一些。

书是文化的结晶，是时代的精神产物。我们讲综合国力，书籍也要体现综

合效益。大专家写小文章是件好事，一本书几万字，看起来举重若轻，但背后有很多学问的支持，像演话剧，前台搭的东西并不多，其实后台有好多支持前台演出的东西。该丛书对于成年人也不失为一部高品位的、可信赖的文化知识读物，要走进全国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更要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我们伟大祖国悠久的传统文化。

任继愈

2008年10月14日



## 前言

金石学是以中国夏、商、周以来的所有古器物作为研究对象，对历代金石的名义、形式、制度、沿革以及该器物上所刻文字、图像的体例、作风等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朱建新（剑心）先生在其所著录的《金石学》一书中明确指出：“案金石之学，实为研究中国三代以下古器物文字之学（见《重版序》），‘金石学’者何？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上自经史考订、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也。（见《通论》）”可见，金石学是一门博大的学问，其涉及范围极为广泛，实际上包括了古器物的绝大部分。

《金石萃编》的作者王昶在其书的序中说：“为金石之学者，非独字画之工，使人临摹把玩而不厌也。迹其囊括包举，靡所不备，凡经史小学暨于山经地志、丛书别集，皆当参稽荟萃，核其异同而采其详略，是非轻才末学能与于此。”王昶的话是很有道理的。自古至今，器物的创制何止千万，仅仅流传至今的器物便难以计数，更不用说那些遭遇兵燹、水旱等灾害以及因自然风雨剥蚀而消亡了的。

感谢以宋代刘原父、欧阳修为首的诸位学者，对金石进行搜集考证，

著录为专书，使金石学以独立的面貌出现于世人面前。此后，吕大临、王黼、薛尚功、赵明诚、洪适、王象之等诸多学者接踵而起，在宋代出现了金石著录的极盛时期。金石学的著录与考订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古代器物为后人认识。虽然元朝与明朝两个时代的学者对金石学的研究并不特别热衷，但到了清代，随着器物发现的丰富程度以及朴学的深刻影响，金石学成为一门显学。

随着搜集、整理并研究金石的学者越来越多，以金石名家的学者也日渐增多，到近代已达数千人之多，研究金石的著作也已远远超过二千种。如此众多的金石学著作，根据其特点，又可以划分为下述若干种类型：

第一种，存目类。这一类以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为代表。欧阳修曾“集古碑千卷，每卷碑在前，跋在后，衔幅用公（欧阳修）名印。其外標以缃纸，束以缥带，题其签曰：‘每碑卷第几’。（见《集古录》跋）”欧阳修亲自完成这些工作。但是，这一工作部头太大，因此，欧阳修将其中有跋尾的四百余篇抄录成书，题名《集古录跋尾》。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见的《集古录》。

第二种，录文类。这一类以宋代洪适的《隶释》为代表。洪适（“适”音“扩”），字景伯，官至翰林。选签枢参政，拜右仆射，号盘洲，谥文惠。其兄弟洪迈、洪遵均有名于当时及后世。《隶释》分十卷，所载多唐人碑（见《隶释》跋），也有一些东汉和魏晋时期的碑文。

第三种，图像类。这一类以宋代吕大临的《考古图》为代表。吕大临，字与叔，登进士第。曾担任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通六经，对《礼记》有深入研究。《考古图》“裒诸家所藏三代秦汉尊、彝、鼎、敦之属，绘之于幅而辨、论形制、文字（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为后人认识古物

留下了直观的图像。

第四种，摹字类。这一类以宋代薛尚功的《钟鼎款识》为代表。薛尚功，字用敏，钱塘人。他熟悉古篆，特别喜欢钟鼎上的文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钟鼎款识》一书“考古、博古之类，尤为详备”。

第五种，纂字类。这一类以宋代刘球的《隶韵》为代表。刘球的生平不详。《隶韵》，又名《碑本隶韵》，“集石刻隶字为之纂注（见《玉海》卷四十五）”。

第六种，音释类。这一类以元代吾丘衍《周秦刻石释音》为代表。吾丘衍，字子行，太末人。嗜好古学，通经史百家，工于篆籀。性格豪爽，不拘小节，不受世俗的约束，自号贞白处士。宋人在摩录金文之时，都会附加释文，但没有出现专门释音、释义的书。吾丘衍《周秦刻石释音》一书补此之缺，故而《佩文斋书画谱》评价道：“篆籀之学至宋季，其敝极矣。子行始倡其说以复于古，而吴兴赵文敏公实和之，其学乃大明。”

第七种，义例类。这一类始创于元代潘昂霄的《金石例》。潘昂霄，济南人，号苍崖。博学雄文，为当时人推崇。官至翰林侍读学士。《金石例》一书于经史子集诸文献中爬梳剔抉，举以原文，说明碑碣之始及碑碣制度、金石文之始、碑碣式、铭文之始、韩愈铭志例、说死及葬之例并论作文法度等等问题。故而明代何乔新《椒丘文集》赞道：“其援据博，其去取精，修辞者得之，真犹法家之有断例也。”

至于著述的范围，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术业专攻或者典藏特点而有所不同。有的以地区作为著述分类的标准，如《吴郡金石志》、《山左金石志》之类；有的以收藏者本人所搜集的金石为准，如《西清古鉴》之类；有的以断代著录，如《两汉金石记》；有的以细类著录，如《古泉汇》专门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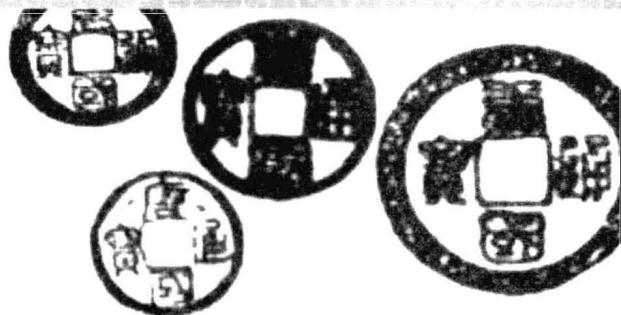
钱币、《集古官印考》专门搜罗玺印中的官印等等……搜集、研究的切入角度，不一而足。

金石学的体例虽然各不一样，搜集、研究的精博程度也各有不同，诚如王昶先生所言“囊括包举，靡所不备”。到了近代，以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董作宾等人为首，充分发挥前代学者之长，并吸收借鉴西方研究方法，在其所著书中对古代器物进行了一番辨订名物、补正经史、考证世溢、训释文字的工作。金石学因为他们的努力，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随着这些先生的努力，以朱建新（剑心）、马衡、陆和九等先生为首的一批学者，量几十年研究的功力，对过去数千年间的金石器物以及名家著述进行了一番总结，《金石学》、《中国金石学概要》、《中国金石学》等文献得以出版。

士澍幼承庭训，浸润六艺，师从刘博琴先生习书法篆刻。求教吴玉如先生、李卿云先生、徐北汀先生授知小学与书画。及长，追随启功先生二十多年，问学考证、义理词章，兼习古籍版本、书画鉴赏、金石碑帖。供职文物出版社近三十年来，编辑古今翰墨、整理文化瑰宝，遍览中华博物之间，与历代名家神交，见识渐长、眼界渐丰。窃不自揆，将金石器物浅见略述于下。士澍学识尚浅，收获尚微，诚不免挂一漏万，渴盼诸位时贤方家多多指正，特致衷心感谢！

# CONTENTS 目 录



## ① 第一章 吉金概览 · 001

- 第一节 古代礼乐器 · 002
- 第二节 度量衡器物 · 012
- 第三节 古钱币 · 020
- 第四节 古代服御 · 029
- 第五节 古代兵器 · 035



## ② 第二章 石刻概览 · 041

- 第一节 主要石刻 · 043
- 第二节 附属石刻 · 048
- 第三节 石刻内容 · 052
- 第四节 古代玺印 · 056



### 第三章 金石学史 · 061

- 第一节 先秦——金石学的胚孕期 · 061
- 第二节 秦汉——金石学的萌生期 · 062
- 第三节 魏晋至隋唐——金石学的蓬勃期 · 064
- 第四节 两宋——金石学的开拓期 · 066
- 第五节 元明——金石学的滞缓期 · 067
- 第六节 清朝——金石学的更变期 · 068
- 第七节 近现代——金石学的规范期 · 070
- 跋语——金石研究的价值 · 073
- 跋 · 077

# 第一章 吉金概览

中国何时进入文明？一些先秦史专家和考古学家认为，青铜器的使用是其重要标志。人类的进化，经过考古判断，始由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然后进入铁器时代。中国的商周时期，青铜器制作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这是吉金创制的最早记载。黄帝作宝鼎的传说，现在没有找到任何考古发现作为补充，孤证难立。但大禹铸九鼎，屡次被发现在经传文献中有记载。《左传》记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墨子》也说：“昔者夏后开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

而且，从目前商文化遗址的发掘情况来看，早商时期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已经出现，铸鼎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大约公元前 16 世纪至公元前 11 世纪，商王武丁的儿子为了祭祀母亲，铸造了一个大鼎，这就是司母戊鼎。该鼎于 1939 年 3 月 19 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的农地中出土，因其腹部著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朝青铜器的代表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司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形制雄伟，气势宏大，纹饰华丽，工艺高超，又称司母戊大方鼎，高 133 厘米、口长 110 厘米、口宽 78 厘米、重 832.84 公斤，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其一耳复制补上的），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

大的青铜器。这件中国商代后期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的发现，充分说明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在当时已经成熟。青铜技术的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当是逐渐发展而成的。由此可知，至迟在夏商之际，青铜技术已经开始有所发展。

周代彝器铭文，多称“吉金”。如邾公华钟记载：“择厥吉金。”王孙遗者钟记载：“择其吉金。”仆儿编钟记载：“得吉金铸铝。”这样的记载很多。吉者，坚实、结实。吉，实际上就是指金属的质地纯美。本章以“吉金”概之，实际上包括以钟鼎彝器为大宗、旁及兵器和度量衡、兵符玺印、钱币、铜镜等金属器物。又出于分类叙述的方便，在重点介绍金属器物时，偶尔也会将以木、骨、牙等制成的器皿放在一起加以讨论。

## 第一节 古代礼乐器

中国是礼仪之邦，自古便重视礼乐。流传至今的古代器物中，礼乐器的数目非常多。礼器，古人总概其名曰“尊彝”，甚至单用“尊”或“彝”来概括。根据用途的不同，又有不同的称呼。如烹煮类的礼器有鼎、鬲、甗等；存放谷物的礼器有敦、簠、簋等；盛酒的礼器有尊、罍、壶等；盛肉的礼器有豆，盥洗的有盘，盛冰的有鉴等。礼器很多，与其相配的乐器也不少，如鼓、铎、埙、磬等。现简要介绍于下。

## 1. 鼎 (dǐng)

鼎本来是古代烹饪用的器具，相当于现在所用的锅，用来炖煮和盛放鱼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道：“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在中国，鼎一直是最常见，也是最神秘的礼器。

鼎的神秘是与大禹息息相关的。传说大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在鼎上，镌刻有魑魅魍魉的图形。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鼎就从一般的炊器发展成为传国重器。国灭鼎迁：夏朝灭，商朝兴，九鼎迁于商都毫京；商朝灭，周朝兴，九鼎又迁于周都镐京；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问鼎中原”的故事。此后，封建王朝往往把建立王朝或者定都称为“定鼎”。

最早的鼎是用黏土烧制的陶鼎，后来又有了用青铜铸造的铜鼎。一般来说，鼎有三足的圆鼎和四足的方鼎两类，这两类又可分为有盖的和无盖的两种。还有一种成组的鼎，形制由大到小，形成一列，称为“列鼎”。列鼎的数目在周朝时代表着不同的身份等级。列鼎通常是单数。据文献及考古发现，在周朝时，九鼎应为诸侯之制，七鼎和五鼎为卿大夫之制，三鼎和一鼎则属于士一级的器物。天子之制为十二鼎，是唯一的双数。但是，至今尚未见周天子之陵墓，因此，这个记载还有待证实。

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商代晚期的青铜鼎，长方形、四足，高133厘米，重832.84公斤，是现存最大的商代青铜器。鼎腹内有“司母戊”三字，是商王为祭祀他的母亲戊而铸造的。清代出土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和颂鼎等都是西周时期的著名青铜器。现代汉字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等多次变化，但仍然保留着“鼎”的风范和形体特征，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 2. 篝 (lì)

鬲是古代的一种炊器，是用于烧煮或烹炒的锅，实际上是鼎的一种。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认为：“古鼎中有三足皆空，中可容物者，所谓鬲也。”这种说法可以说是一语中的。黄现璠在《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之探讨》一文中认为，钟鼎文中有“臣十家鬲百人”，从这句话来分析，“鬲”的意思与“庶”一样，是家中烧锅煮饭的奴仆。

新石器时期，已经有陶鬲。这些陶鬲一般口沿外倾，有三个中空的足，便于炊煮时加热。铜鬲流行于商代至春秋时期，最初是依照陶鬲制成的。商代前期的鬲多无耳，到了商代后期，鬲的口沿上一般有两个直耳。西周前期，鬲多为高领、短足，并常附有耳。西周后期到春秋时期，大多数的鬲折沿、折足、弧裆、无耳，有的在腹部还有觚作为装饰。

除了圆形的鬲之外，到了西周时期，还有一种体为长方形的方鬲。这种鬲的下部有门，可以开合，由门内放入木炭进行加热。

## 3. 龊 (yǎn)

甗是蒸食器，流行于商至汉代。该器造型分上下两部分：甗和鬲。上部用以盛放食物，称为甗；下部用以煮水，称为鬲。鬲的高足间可烧火加热。在甗的底部有一个穿孔的箅，便于蒸汽通过。在甗中，甗与鬲有的连体，有的则是分开的。

商代的甗多为圆形、直耳、侈口（口沿向外倾）、束腰。其腹袋状，腹下设有锥形或者柱形足，器体相对厚重。早期花纹简单，晚期多用兽面纹装饰。到了西周，除沿袭商代的形式外，还出现了附耳。上下部可以分开的甗，在下半部（鬲）上也加有附耳。与此同时，还出现了长方形的甗。



春秋战国时，甗的器身变得相对较薄，许多器物不再用花纹装饰。

西周末春秋初，这种实用性很强的甗往往作为礼器，与鼎、簋、豆、壶、盘等组成成套的随葬品，置于墓中。现在考古发现的甗多为联体铸造，间或有分体铸造的形式。最独特的，当属1976年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的三联甗，通高35.5厘米，不仅甗、鬲分体，而且鬲为长方形，六只方足，腹底平而中空，可以盛水，其下可以焚火。案面上，有三个灶孔，分置三甗，可以同时炊煮三种食物。

#### 4. 簋 (gu ī)

簋是商周时重要的礼器，用于放置熟食。《说文解字》中记载：“簋，黍稷方器也。”圆口，《周礼·舍人》注释上说“皆云圆曰簋，谓内圆也”，说的便是簋的圆口。在宴席和祭祀时，簋往往以偶数与列鼎配合使用。《周易》记载：“二簋可用享。”史书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簋一般两耳或四耳，流行于商至春秋战国时期。

簋的形制很多，变化也较大。在商代，簋的器身多饰兽面纹，有的器耳做成兽面状。其形体厚重，多为圆形、侈口、深腹、圈足、两耳，也有一些无耳。西周时，出现了四耳簋、四足簋、圆身方座簋、三足簋等各种形式，部分簋上加盖。此时的簋形体依旧厚重，以云雷、乳钉等为纹饰，也有少数簋仅饰一两道弦纹，甚至完全没有纹饰。春秋时期，簋的铜胎变薄，花纹细碎，有的簋盖铸成莲瓣形。战国以后，极少见到簋。

#### 5. 敦 (du ī)

敦是古代用来盛放黍、稷、粱、稻等饭食的一种青铜器皿，由鼎和簋的形制结合发展而成。与鼎、簋一样，敦很早便从盛储器转变成为礼器。《周礼》上曾记载：“有虞氏之两敦。”便是敦作为礼器的较好证明。

敦的形状有点像盂，有的敛口（口沿向内），有的侈口。有盖，称为“会”。在其下，有圈底，或者连着方形座，或者用三足支撑。往往也有两大耳，有的耳下垂，形如珥。在盖上有圈，取下放置时，盖上之圈可以当足。值得注意的是，图录学家称为“彝”的器物，从其形制来看，应该是敦。关于这一点，王国维在《古礼器略说》中有所叙述。

春秋是敦发展的关键时期。敦于春秋中期产生，盛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秦代以后逐渐消失。在祭祀礼仪上，敦逐渐取代簋，与鼎配套使用。战国之后，敦又被后起之秀——盒取代。

## 6. 盒 (hé)

盒，或者称为盒子，是自战国之后盛行于世的一种盛器。该盛器由底盖相合而成，也有呈抽屉式的。在祭祀等礼仪上，盒子逐渐取代敦和簋，成为常用器皿。

至于盒子的材质，也各有不同。有的盒子甚至使用纯金打造，如宋徽宗《宫词》中就有“小金盒子黄金帖”这样的话语。而比较普遍的，是使用竹、木等制成的盒子。有的盒子外涂有漆，称为“漆盒”。

盒子的使用范围极其广泛，食品、饰物等等，都用它来盛装。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道：“唯将旧物表深情，钿盒金钗寄将去。”说的是用它来装饰品。而《红楼梦》中也记载：“明日就拣我们爱吃的东西做了，按着人数，再装了盒子来。”这说的是用它来装食物。到后来，人们往往用盒

